

# 教育与经济发展:雾里看花何处是尽头

杨克瑞

(沈阳师范大学 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 辽宁 沈阳 110034)

**摘要:**作为教育经济学核心问题的教育与经济关系,长期以来都被人们赋予美好的寄托,以便为弘扬教育而提供更为有利的依据。然而,这种雾里看花似的臆测估计所带来的教育大跃进,并非是教育的福音,而是社会的灾难。增长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在于技术,有关教育经济贡献的实证是不足的,盲目夸大教育的经济作用,是狐假虎威的现代翻版。

**关键词:**教育经济学;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筛选理论;谬误回归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1)02-0072-03

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特别是教育对于经济推动的关系,是教育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也是教育经济学这门学科产生的主要动力。多少年来,人们都带着美好的期盼来探索二者的关系,甚至还动辄以“国运所系”这样的强势话语来为“教育先行”助威。<sup>[1]</sup>这种热衷于渲染教育的经济价值的思想,意在引起有关部门对于教育的重视,就其动机而言可谓是高尚的,不过,其内容却更像现代版的狐假虎威。随着增长经济学研究的进展,我们却不得不正视这样一种现实,即经济发展的真正推动力量在于技术进步,用教育来解释是很不准确的,甚至是一种误导。告别浪漫,端本清源,真正认清教育在经济发展中地位与价值,其结论也许稍显冷峻,却正是人们要客观认识的真相。

## 一、对教育经济学的反思

众所周知,教育经济学的产生,源于教育经济关系的考察,即人力资本理论的确立。经过20世纪60年代前后舒尔茨等发展经济学家们对教育的摇旗呐喊,世界各国普遍重视教育的发展。然而,正当一些国家的教育热情高涨之际,之后的经济危机可谓当头棒喝,一盆冷水灌了下来,随之而出现了严重的大学生失业现象。

进入70年代不久,人们开始对这种大跃进产生了怀疑的态度和幻灭的情绪。在这种可谓残酷的事实面前,一些对教育问题感兴趣的经济学家马上“城头变换大王旗”,不再坚持人力资本观,而提出了相应的“教育筛选”理论、“二元社会分割”以及“文凭病”理论等等新的解释观点。<sup>[2]</sup>这些理论的基本思想在于,它们看到了教育与个人收入之间的有限联系,但这种联系是表面的,是社会选择的结果。对于任何国家或社会,良好的职业岗位总是有限的,属于社会稀奇资源,是全社会竞争的目标。<sup>[3]</sup>为了增强个人的竞争砝码,人们在不能改变个人的先天条件的情况下,只能去改善个人的后天条件,于是人人都希望获得较高文凭,从而获得较好的地位。<sup>[4]</sup>但是,这从整个社会来看,往往形成教育的无序竞争状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教育投资过量,高水平教育文凭获得者找不到相应工作岗位,甚至找不到岗位的过量教育现象。

正当人们对于教育的经济意义莫衷一是之际,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到来再次令人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教育,知识经济似乎为教育赢得了新的地位与希望,卢卡斯等新增长理论学家们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

收稿日期:2011-02-24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教育部重点课题“高校内部治理的交易费用及其组织效能研究”(DIA090167)

作者简介:杨克瑞(1968-),男,山东鄞城人,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教授,教育学博士。

试图再次为人力资本理论正名。那么，知识经济是否就意味着人力资本呢？

## 二、增长经济学者的发现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世界发展的巨大落差令许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或者增长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这也正是经济学这门学科在世界范围内一路高奏凯歌的根源所在。反观增长经济学的历程，我们发现其与教育的关系若即若离，教育也随之大起大落。那么，增长经济学家是如何看待教育的呢？

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开始了经济增长问题的探索，因之才有《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出现，这也就是流传深远的《国富论》。当时亚当·斯密将经济增长主要归功于社会分工，即社会专业化的发展。在这里，他也最先认识到了教育的经济价值，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思想。之后的凯恩斯等经济学家，所讨论的问题也都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

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经济学研究中，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在技术以及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率是由储蓄率和资本与产量比率这两因素所决定的，公式为： $G = S\sigma$ ；其中  $G$  表示经济增长率， $S$  表示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 $\sigma$  是资本产出系数即资本的生产率。由于  $\sigma$  被假定为不变， $S$  就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这种对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

1956年，索洛在仔细研究了哈罗德的理论后，指出其模型的问题在于隐含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由此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式则放宽了上述条件假设，即考虑到了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且资本和劳动的比例也是可以市场化变动的。其经济增长的公式也可以更为流行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加以说明： $Q = f(L, K)$ 。教育因素在这里被考虑到了，但它被视为一种外生变量。<sup>[5]</sup>

进入新经济时代以来，人们再次看到了技术的巨大力量，将技术因素内生生化也就推动了增长经济学的新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和卢卡斯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摒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思想，被称为新增长理论。罗默的内生技术进步增长模型，有三个基本认识：第一，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所谓技术就是将投入转换成产出的方式；第二，大部分技术进步乃出于市场激励而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亦即，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创意或知识品改进了生产技术，因为一种创意将会使给定投入产生更多或更好的产品；第三，创新能使知识成为商品。<sup>[6]</sup>

从增长经济学的研究来看，他们越来越明确地将技术因素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不是再笼统地议论整个教育因素了，这就是现代增长经济学的基本认识，也是对教育经济学的基本启示。这就是说，知识经济中的知识特指的是技术知识，而非所有知识，它不等同于人力资本，更不等同于教育。

## 三、教育实证中的谬误回归

那么，过去很多关于教育对于经济推动作用的研究，其结论又当如何评价呢？现在不妨再重新考证研究过程，分析其结论的可靠性。在传统貌似科学的研究过程中，学者大多是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来求导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实际上就是建立自变量与因变量数据之间的回归方程，利用最小二乘法来求其自变量回归系数。若以中国1991—2001这1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教育经费投入的数据，的确可以得出一基本的回归方程关系，即： $Y = 16\ 359.502\ 532 + 0.001\ 903 * X (R^2 = 0.94)$

但是，若以中国的教育投入为自变量  $X$ ，而以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因变量  $Y$ ，我们不难发现，这两组数据同样也是可以建立一回归方程，且基本能通过统计学的检验。我们以下表数据为例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Y = 64\ 598.89 + 839.279X (R^2 = 0.964)$$

但是，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回归方程只说明了数据之间的关系，它是无法做出因果解释的，这也是回归分

析在使用中的常见误解。试想,这里将中美两国的数据进行毫无意义的关联回归,演出一场“关公战秦琼”,其回归方程同样也是存在的。但我们总不应据此得出结论:中国教育经费的增加可促进美国经济的增长。

同理,若改变自变量,例如,若以当前的物价等任何数据,都可看出其与国民经济是同步增长的,其回归方程同样是可成立的。此外,关于因变量与自变量关系,是研究者所设定的,将二者的关系倒过来,同样也是可以构建回归方程的。这种简单构建回归关系的研究,在计量经济学上是有明确的定位,即谬误回归,即缺乏现实意义的数字回归。从这里不难看出,传统上关于教育与经济增长的所谓“实证”,大多是不科学的,不足为凭的。

即使教育经济学奠基人舒尔茨关于经济发展的“余数分析”,事实上他也并没有揭示教育在经济发展的直接关系,而是对于经济增长的“余数”与同期教育经费增加二者之间关系的推定,同样也是合理想象的结果,而非严格的科学结论。

#### 四、教育与经济:水涨船高

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之所以迷雾重重,源于现实中的这样一种现象,即其二者往往表现为共存的。例如,经济发达地区往往伴随着教育的发达,这人们往往都会以日本、美国等为例说明。这样,二者给人的印象就是共生的,似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显然,这种共存现象,决不是等量齐观的,其必然存在着先后与主次关系。教育学者都希望能看到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以便可推动所谓的“教育先行”,增加教育在社会上的分量或砝码。然而,正如前面的分析,教育先行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济增长研究的证实,相反,是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教育的提高。这可从以下两方面具体说明。

第一,教育存在的依附性。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有关于教育本质的广泛争论,其实,教育活动如此司空见惯而无需上纲上线。相对于经济水平,教育天然具有高度的依附性,并形成了水涨船高的连带关系。在经济水平提高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教育供给与消费水平也有了大幅提高,教育水平的高增长是必然的。教育提升是社会进步的综合表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如同社会其它领域的进步是相同的。特别是在今天,教育条件进一步得到了改革,其对于经济水平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哪怕是教育质量没有同步提升,但教育资源的改善也是人们生活福利提高的重要表现。

第二,经济发展搭建了教育的磁力场。经济发达地区的确是需要更多的高级教育人才,但这与本地教育水平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人是易于流动性的,高水平的经济条件是方便吸引相应人才进入的,所谓“种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就以中国的现实而言,深圳崛起是特区经济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才发展起来深圳大学。相反,西安虽然是中国高校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其经济并没有因此而腾飞。舒尔茨在论述人力资本的增长途径时,也提到了国际移民现象。

总体而言,教育与经济的发展是以技术为纽带的,但技术不等于教育。单就教育与经济而言,教育的发展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水涨船高,其不可超越于历史所赋予的阶段性和拔苗助长。教育就是教育,我们应当认真重视,但不应就此上纲上线而大做文章。

表 1 内蒙古教育经费与美国 GDP 增长的模拟比较

年份	内蒙古教育经费合计 (亿元)X	美国 GDP(亿元)Y 以 2000 年不变价格
1991	9.67	71 005
1992	11.32	73 366
1993	14.57	75 327
1994	17.19	78 355
1995	19.99	80 317
1996	23.44	83 289
1997	25.43	87 035
1998	28.02	90 669
1999	32.78	94 703
2000	35.80	98 170
2001	46.62	98 907

数据来源:参见内蒙古教育厅及美国教育经费教育部网站。